

# 陶瓷中的玻璃印象

## 探索唐宋陶瓷幾種裝飾的來源

■ 林容伊

陶瓷的胎土易於塑形，經乾燥、窯燒之後又堅固耐用，只要透過陶工的巧手，以及模範和各種成形、裝飾工具的使用，可以製作出千變萬化的造型，也因而時常被用來模仿其它材質的器物。隨著研究者的努力，已能在眾多的陶瓷器形與裝飾之中，一點一滴地拼湊出屬於金屬器、玻璃器等其他工藝特色的痕跡。本文即以中國唐宋陶瓷的幾種裝飾為例，探索其受到外來玻璃器影響的可能性。<sup>1</sup>

不論是古代的文物，甚或是現今生活中的器物，都可以觀察到某些器形、紋樣與色彩組合等特色，較常見於陶瓷、金屬、玻璃或漆木等某種特定材質／工藝類別的器物。而不同材質的工藝作品，也時常會模仿彼此的器形或裝飾紋樣。工藝之間的交流與模仿，很多時候是作為替代使用，例如模仿青花瓷碗盤的美耐皿；有時也可能是追求裝飾趣味，例如模仿木器紋理的陶瓷等。

很早就有許多學者注意到陶瓷器模仿青銅器、金銀器、玻璃器、玉器等其他工藝的現象，並且提出過不少討論與案例比對；透過工藝交流角度的觀照，也能為一些在某個時期突然出現於陶瓷上的造型及裝飾尋求來源和解釋。本文提出唐宋陶瓷的幾種裝飾，透過風格造型的比對，思考其受到西方玻璃器啟發的可能性。需特別說明的是，文中使用的「西方玻璃器」一詞是為行文與閱讀之便的略稱，主要指稱西亞、中亞與埃及等廣大區域所生產的玻璃容器，

地域範圍為廣義的「西域」、「西洋」。此外，唐宋時期遠程貿易熱絡，雖然從文獻可知進口西方玻璃器經由陸路與海陸頻頻輸入中國且備受時人寶愛，然而或許由於廢玻璃可回收再行利用的特性，相較之下考古出土的實物數量仍十分有限，因此較難提出可能對陶瓷產生影響的玻璃器具體傳入的證據。儘管如此，仍將案例比對分析如下，聊備一說。

### 凸粒紋

唐三彩的作品中，有些在器表以密集的圓形凸起作為裝飾紋樣，在此暫稱為凸粒紋。過去已有學者注意到，凸粒裝飾可能受到外來工藝的影響。Regina Krahl 考察唐代陶瓷與羅馬玻璃器的關係時，指出：「唐代陶瓷之中最奇特的裝飾類型之一，是一種見於小碗器表的顆粒狀凸起……西方曾藉著將玻璃吹入模型製作出類似的效果，器表帶有規則的凸起，仿若水果一般，令人聯想起葡萄。相對少見但更為近



圖1 唐 三彩三足鎊 瑞士玫茵堂藏 取自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3*, London: Paradou Writing Ltd., 2006, Cat no. 1285.



圖2 前1世紀以前 玻璃瓶 高6.2公分 義大利那普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藏 取自Regina Krahl, "Reflections of Roman Glass in Tang Ceramics," fig. 9.



圖3 2-3世紀 玻璃瓶 高12.9公分 以色列博物館藏 取自Yael Israeli, *Ancient Glass in the Israel Museum*, Cat no. 414.

似的是一種地中海地區的容器，其以細小的玻璃顆粒隨意貼附在器表之上，顯然模仿自西方陶器技法」。其以瑞士玫茵堂（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收藏的〈三彩三足鎊〉（圖1）為例，比對瓶身上布滿大大小小凸粒的羅馬〈玻璃瓶〉（圖2），該瓶推定製作於公元前一世紀以前，現藏於義大利那普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Naples）。<sup>2</sup>而其文中所指以有模吹製法製成，規則且近似葡萄果實的凸粒紋，可見於羅馬玻璃瓶、罐、杯等器類，例如一件藏於以色列博物館（The Israel Museum），定年於二至三世紀的〈玻璃瓶〉。（圖3）不過玫茵堂藏〈三彩三足鎊〉的凸粒大小不一，確實較接近那普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藏品。

除了如前述的凸粒紋類型，另外有一類屬於初期三彩陶器、以模印方式成形的小盃，紋樣也可能受到玻璃器的影響。這類小盃出現於七世紀後半，為唐三彩中年代較早的作品，以唐咸亨三年（672）遷葬的遼寧朝陽市中山營子勾龍墓，以及同省朝陽市綜合廠二號墓出土者（圖4）為代表，<sup>3</sup>另外也出現在江西瑞昌市



圖4 唐 三彩小杯 口徑11，高5公分 遼寧朝陽市綜合廠二號墓出土 取自龜井明德，〈陶范成形による隋唐の陶瓷器〉，頁65。



圖5 唐 三彩小杯 高4.4公分 英國里茲紐薩姆寺博物館藏 取自龜井明德，〈陶范成形による隋唐の陶瓷器〉，頁66。

南義鎮但橋唐墓和山東陵縣咸亨三年東方合墓等，被認為是跨省區流行於許多地區的時髦商貨。<sup>4</sup>同類品尚可見於英國里茲紐薩姆寺博物館（Temple Newsam House）（圖5）、日本出光美術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sup>5</sup>製作方式為以印模壓印成形，河南鞏義市黃冶窯址曾發現可能用來製作此類小盃的印模。<sup>6</sup>大致而言，這些小盃的紋樣是以植物枝桠般的凸線從外底心伸展而出，覆蓋器外壁，其間填以凸粒紋或短促的



圖7 874年 青瓷八稜瓶 高21.5公分 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地宮出土 取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5·陝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35。



圖8 9-11世紀 玻璃瓶 日本私人藏 取自謝明良，《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陶瓷手記》，頁14，圖31。



圖9 9世紀 玻璃瓶 高20.2公分 伊朗地區生產 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洋古代ガラス》，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78，圖427。



圖6 3-4世紀 玻璃瓶 以色列博物館藏 取自Yael Israeli, *Ancient Glass in the Israel Museum*, Cat no. 276.

陰刻線。具體上來說有些難以名狀屬於何種紋樣，但隱約令人聯想起植物枝枒與果實。以色列博物館藏有一件以有模吹製法成形的羅馬〈玻璃瓶〉（圖6），推定為三至四世紀時由敘利亞生產，其器腹的紋樣為伸展捲曲的凸線參雜凸粒紋，狀似葡萄藤蔓與果實，頗類似上述三彩小盃的紋樣構成，可以考慮羅馬玻璃作為此類小杯紋飾來源的可能性。

垂直凸稜裝飾

曾有學者不約而同地注意到，陝西扶風縣法門寺晚唐地宮（874年封閉）出土的越窯〈青瓷八稜瓶〉（圖7），祖型應來自伊斯蘭玻璃長頸瓶，並以一件日本私人收藏之九至十一世紀伊斯蘭〈玻璃瓶〉為例。<sup>7</sup>（圖8）該件瓶細長的頸部往下至器肩處逐漸擴張，頸部底端以玻璃條環繞一周，作成圓鼓凸出的弦紋，器肩豐圓，至器底弧度漸收，器身有數道凸稜，整體器形特徵與法門寺越窯〈青瓷八稜瓶〉極為相似。

### 垂直凸稜裝飾

雖然一般普遍認為，與該件日本私人藏伊斯蘭玻璃瓶類似的玻璃器形，主要盛行於十一至十二世紀，產地包括伊朗、敘利亞以及中亞，不過作法相近的玻璃長頸凸稜瓶也有被定年為九世紀的早期例子，例如1978年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古代ガラス」展覽裡，推測為伊朗地區生產的一件〈玻璃瓶〉。（圖9）此種頸部細長，器肩圓鼓，至器底弧度內收的瓶類早自一世紀的羅馬玻璃已經出現，<sup>8</sup>是頻見於西方玻璃的器形。而器身飾數道垂直凸稜的作法，約從一世紀起便為西方玻璃時常使用的技法，成形方法多元。公元前一世紀至一世紀在東地中海地區流行的帶垂直凸稜紋的〈玻璃碗〉（圖10），是利用模鑄法成形；從江蘇邗江劉荊墓出土的殘片可知，<sup>9</sup>這種器形的碗也曾於一世紀時傳入中國。此外，也有在吹製成形的器身上



圖10 前1世紀至1世紀 玻璃碗 口徑15.2，高6.1公分 The Yüksel Erimtan Collection 取自Chris S. Lightfoot, *Ancient Glass of Asia Minor*, 33.



圖11 1-4世紀 玻璃罐 高6.5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貼飾玻璃條的方法，或貼飾玻璃條以後再用鉗子類的工具塑形（圖11），甚或有用鉗子直接夾出凸稜者（圖12），以及在吹製玻璃時利用模子一併成形的垂直凸稜玻璃作品（圖13），這幾種作法於一世紀時皆已經出現。<sup>10</sup>到了伊斯蘭時期（The Islamic Period），飾以垂直凸稜的玻璃器，仍有以玻璃條貼飾、再使用鉗子類工具修飾者，如伊朗尼撒爾出土的十世紀



圖12 4世紀 玻璃執壺 高16.9公分 敘利亞生產 日本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藏 取自涉谷区立松濤美術館編輯，《特別展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所藏——オリエントのガラス》，東京都：涉谷区立松濤美術館，1987，圖63。



圖13 1世紀 玻璃碗 口徑10.1，高5.1公分 The Yüksel Erimtan Collection 取自Chris S. Lightfoot, *Ancient Glass of Asia Minor*, 59.

雖然一般普遍認為，與該件日本私人藏伊斯蘭玻璃瓶類似的玻璃器形，主要盛行於十一至十二世紀，產地包括伊朗、敘利亞以及中亞，不過作法相近的玻璃長頸凸稜瓶也有被定年為九世紀的早期例子，例如1978年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古代ガラス」展覽裡，推測為伊朗地區生產的一件〈玻璃瓶〉。（圖9）此種頸部細長，器肩圓鼓，至器底弧度內收的瓶類早自一世紀的羅馬玻璃已經出現，<sup>8</sup>是頻見於西方玻璃的器形。而器身飾數道垂直凸稜的作法，約從一世紀起便為西方玻璃時常使用的技法，成形方法多元。公元前一世紀至一世紀在東地中海地區流行的帶垂直凸稜紋的〈玻璃碗〉（圖10），是利用模鑄法成形；從江蘇邗江劉荊墓出土的殘片可知，<sup>9</sup>這種器形的碗也曾於一世紀時傳入中國。此外，也有在吹製成形的器身上



圖14 10世紀 玻璃瓶 伊朗尼撒蒲爾出土  
取自Jens Kröger, *Nishapur*, fig.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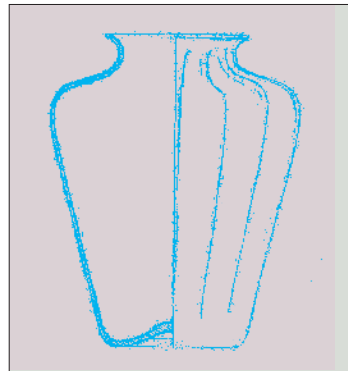


圖15 942年 玻璃瓶 高12.2公分 廣州南漢康陵出土 原圖取自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廣州南漢德陵、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7期,頁22,圖37。重製



圖16 唐 邢窯 白瓷八稜罐 帶「盈」字款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趙慶錕等主編,《千年邢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圖17 北宋 越窯 青瓷八稜瓶 高18.5公分 江蘇鎮江市東南郊烏龜山北宋墓出土 取自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陶瓷全集·8·宋(下)》,上海:上海人民美術社,2000,圖52。



圖18 10世紀 越窯系 青瓷八稜瓶 高27.3公分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取自出光美術館編,《青磁の美:秘色の探求》,東京都:出光美術館,2006,頁23。



圖19 宋 白瓷四繫小罐 高11公分 廣東省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陶瓷全集》,圖189。

〈玻璃瓶〉(圖14),<sup>11</sup>不過最常見到的還是直接使用模範吹製成形的作品。位於廣州的五代(942年)南漢康陵出土的伊斯蘭〈玻璃瓶〉(圖15),即有模吹製成型的垂直凸稜紋作品,並且從出土地來看,可推知此種玻璃器有可能經由海路傳入中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帶「盈」字款的邢窯〈白瓷八稜罐〉(圖16),器形與法門寺越窯〈青瓷八稜瓶〉的器身大致雷同,豐肩以

下弧度漸收,並且兩者足部皆略為外撇。該件作品器口處不甚自然,原先應另有口、頸部。雖然該罐尺寸不詳,然而從器形的相似性,以及很可能經磨削整理過後的缺口部分,與器肩的大小比例看來,或許這件邢窯作品原先亦裝設有如同法門寺越窯作品一般的長頸。兩者相異的地方在於,越窯〈青瓷八稜瓶〉的稜線兩側帶有斜面,接近器底處稜線消失轉為內收的三角形平面;而邢窯〈白瓷八稜罐〉的稜線僅



圖20 12世紀 黑釉鐵斑白堆線紋瓶 高22.6公分 取自相賀徹夫編集,《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學館,1975-1987,圖247。



圖21 12世紀 黑釉堆線紋執壺 高23.1公分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取自西田宏子、佐藤アラ編著,《天目》,東京都:平凡社,1999,圖71。



圖22 北宋 醬釉罐 口徑10,高10公分 安徽望江縣青龍嘴北宋墓出土 取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8·安徽》,圖91。

以貼飾的泥條代表,兩側略凹,稜線同樣在接近器底處中斷,不過並未做出如越窯瓶一般的三角形平面。整體而言,兩者對於稜線的作法雖有不同,概念仍十分近似,可能擁有共同的參考原型。

此種八稜器式到了宋代仍持續發展,如江蘇鎮江市東南郊烏龜山北宋墓出土的越窯〈青瓷八稜瓶〉(圖17),以及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十世紀越窯系〈青瓷八稜瓶〉。(圖18)這兩件十世紀的八稜瓶,皆在每道突起的凸稜兩側刻劃細線以強調之,遠觀時,這些凸稜仿若另外以泥條貼飾般立體。至於廣東省博物館收藏的〈白瓷四繫小罐〉(圖19),其器身的六道稜線則是直接削刮去兩側的胎土而形成。

可能受到這些垂直凸稜紋飾影響的唐宋陶瓷,也包括被日本稱為河南天目的一系列黑釉堆線紋作品。<sup>12</sup>(圖20、21)這類作品可見於河南寶豐清涼寺、新密窯溝、鶴壁集、西街、河北磁縣觀台、山東淄博磁村與坡地窯址,以及赤峰乾瓦窯等窯址,其中如淄博磁村窯及赤峰乾瓦窯也出土白釉堆線紋的作品。<sup>13</sup>雖然欠缺確切的紀年作為參考,但是從器形推測出現於十二世紀,流行於十三世紀;而堆線紋裝飾的



圖23 北宋 青白瓷高足杯 高11.8公分 江蘇鎮江諫壁磚瓦廠北宋墓出土 取自楊正宏等主編,《鎮江出土陶瓷器》,北京:文物,2010,圖180。

作法,是在器表貼飾以白土做成的細泥條,或是將白泥在器表上堆成垂直的凸線,等乾燥後再施釉,<sup>14</sup>一說也有直接在坯胎上刻出凸線的作品。<sup>15</sup>

### 旋紋刻花

宋代華南地區的窯場,出現了一些在器身上以螺旋方式刻花裝飾的作品,這種裝飾手法在宋代以前罕見,在此暫稱為旋紋刻花。如安



圖24 10世紀後半至11世紀 青白瓷蓋盒 印尼海域印坦沈船出水 取自謝明良,〈關於所謂印坦沈船〉,《陶瓷手記》,頁314,圖17。



圖25 10-11世紀 玻璃杯 高7.2公分 科威特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Stefano Carboni, *Glass from Islamic Lands*,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2001, Cat no. 3-39.



圖26 9-11世紀 玻璃瓶 高10公分 以色列博物館藏 取自Yael Israeli, *Ancient Glass in the Israel Museum*, Cat no. 475.

徽望江縣青龍嘴發現的一座北宋墓出土了一件〈醬釉罐〉(圖22),以深刻花的技法在器身上刻出旋轉的斜線,兩道深刻線使得中間的間隔彷彿成爲立體的凸稜。江蘇鎮江諫壁磚廠北宋墓出土的一件〈青白瓷高足杯〉(圖23),杯外壁也以相同的方法刻飾。安徽繁昌縣老壩沖宋墓中屬北宋早期的二號墓,出土一件裝飾及形制皆與諫壁磚廠北宋墓相近的繁昌窯〈青白瓷高足杯〉。<sup>16</sup>由於這類高足杯的內壁僅施半截釉,內底無釉,有可能是作爲爐使用的杯式爐。老壩沖宋墓的十一號墓還出土了同樣飾以旋紋刻花的繁昌窯〈青白瓷蓋盒〉,該類蓋盒還見於印尼海域出水的印坦沈船。(圖24)這類突現於宋代華南窯場的旋紋刻花裝飾,若追索其裝飾來源,可考慮受到伊斯蘭玻璃器中旋轉凸稜紋玻璃器啓發的可能性。

西方玻璃的旋轉凸稜紋玻璃器流行年代悠長且較爲普遍。製作方法與前面討論的垂直凸稜紋玻璃有關,首先製作出具有垂直凸稜的玻璃器後,趁著器身未涼,旋轉仍連接器身的吹管,或調整器形時附著器底鐵棒,使得器身的垂直凸稜隨之扭轉成爲旋紋;也可能是在器身

尚未完全吹製完成以前,先用鉗子類的工具夾出紋樣;三至四世紀的羅馬玻璃已經出現此種玻璃器。<sup>17</sup>繼承羅馬工藝傳統的伊斯蘭玻璃器,也頗常見此種旋紋裝飾,如收藏在科威特國立博物館(The Kuwait National Museum)十至十一世紀的〈玻璃杯〉(圖25),或藏於以色列博物館的九至十世紀〈玻璃瓶〉(圖26)等。

### 借鑒、轉化與應用

上述所談論的可能受到玻璃影響的幾種唐宋陶瓷裝飾手法,都只是局部借鑒,而非整體性、一模一樣的仿效;事實上,陶瓷對其它工藝品的模仿時常出現轉化、應用的情形。有學者曾注意到,雖然中國鉛釉陶處處見得著模仿金屬器的痕跡,但能確證爲直接原型的金屬器卻十分有限,除了因爲現今所見之金屬器出土數量較少的關係之外,也存在許多局部模仿與重新改作的情形。<sup>18</sup>也有看法認爲,缺乏創造性的完全模仿是比較初階的藝術概念,很快就被中國陶工所揚棄,而偏好添入在地文化的重新詮釋,例如在模仿波斯東北及粟特地區所製的金屬執壺時,安置了如鳳首造型等經改造、調

整過的元素。<sup>19</sup>此外亦有研究者指出唐三彩中推測受到異國工藝影響的部分,是反映出各種外來文化元素的集合,不僅取用一些西亞與中亞金屬器的傳統器形,其中某些色彩與紋飾的安排又近似當時的織品(部分源自中亞),在熟稔舶來品的菁英階層眼中,很可能激發對於異域來源的綜合聯想;這些來自遙遠地域的新工藝技術與樣式,不僅稀少昂貴,也暗示擁有者背後的權力。<sup>20</sup>

以玻璃器來說,其本身具有鮮亮的色彩、澄明的質感、多元的器形與裝飾特色,尤其進口的外來玻璃器在中國往往被視爲貴重之物,從中汲取裝飾元素,得以爲陶瓷器的造型添增不少變化與美感。整體而言,局部模仿與轉化的案例,可以說是來自其他工藝的特色,已經被萃取、轉化爲適用於陶瓷的裝飾元素。陶工擁有重新組合、創新的彈性與自由,從而賦予陶瓷作品更爲豐富的內涵。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 註釋

1. 本文節選並改寫自筆者2014年1月完成之碩士論文〈唐宋陶瓷與西方玻璃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該文承蒙指導教授謝明良悉心指正引導,以及論文口試委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梁廣堯名譽教授、藝術史研究所施靜菲教授惠賜寶貴意見,才得以完成;又承蒙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陳東和副研究員邀請撰文參與此次玻璃專輯,在此一併致上誠摯的謝意。
2. Regina Krahl, "Reflections of Roman Glass in Tang Ceramics,"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2 (2007): 90.
3.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遼寧朝陽隋唐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1982年6期,頁86-101。
4. 謝明良,《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社,2014),頁89-90。
5. 龜井明德,〈陶範成形による隋唐の陶瓷器〉,《出光美術館館報》,1999年106號,頁64-67。
6. 河南省鞏義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編,《黃冶唐三彩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圖版15之4、6。

7. 謝明良,〈關於玉壺春瓶〉,原刊《故宮文物月刊》,291期(2007.6),頁39,後收於《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42;森達也,〈ペルシアと中国——陶磁器、金屬器、ガラスに見る東西交流〉,《陶說》,卷650(2007.05),頁24。
8. Stuart J. Fleming, *Roman Glass: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Change*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1999), 32, pl. E. 39.
9. Chris S. Lightfoot, *Ancient Glass of Asia Minor: the Yüksel Erimtan Collection* (Ankara: C.S.Lightfoot and Melih Arslan, 1992), 33.
10. 參見 Stuart J. Fleming, *Roman Glass*, 11, 18-19, 31-42, 54, 109.
11. Jens Kröger, *Nishapur: Glass of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5), 104-105, 109-110.
12. 附帶一提,日本出光美術館所藏的該件堆線紋注壺,器形也與西方工藝品頗爲雷同,如科威特著名私人收藏 Al-Sabah Collection 中的的伊斯蘭銅質注壺,據說在伊朗尼撒普爾八至十三世紀的地層也發現幾件同器形的水注,此種水注還可以回溯到一世紀的羅馬玻璃,例如以色列博物館的藏品。參見 Qaddūmī, Ghādah ijāwī, *Variety in unity: A Special Exhibi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fth Islamic Summit in Kuwait* (Kuwait: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1987), 126; Yael Israeli, *Ancient Glass in the Israel Museum: The Eliahu Dobkin Collection and Other Gifts* (Jerusalem: The Israel Museum, 2003), 128, fig. 127.
13. 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43,圖3-39、62-65;孫新民等,《河南古代瓷窯》(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2),頁175、255。
14. 長谷部樂爾,〈磁州窯·河南天目〉,《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學館,1975-1987),頁247。
15. 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頁44。
16. 望江縣文物管理所,〈安徽望江縣青龍嘴北宋墓〉,《考古》,1991年4期,頁380-381;肖夢龍,〈江蘇鎮江諫壁北宋墓出土的瓷器〉,《考古》,1980年3期,頁246-247;繁昌縣文物管理所,〈安徽繁昌縣老壩沖宋墓的發掘〉,頁915-929。
17. 參見 Stuart J. Fleming, *Roman Glass*, 109; Chris S. Lightfoot, *Ancient Glass of Asia Minor*, 115.
18. William Watson, "Precious Metal—Its Influence on Tang Earthenware," in Michael Vickers ed., *Pots and Pans: A Colloquium on Precious Metals and Ceramics in the Muslim, Chinese and Graeco-Roman Worl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61, 172-173.
19. Margret Medley, *Metalwork and Chinese Ceramics*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2), 4.
20. Jessica Rawson, "Inside Out: Creating the Exotic within Early Tang Dynasty China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World Art* 2:1 (2012): 25-45.